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六編 第十五冊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陳昀秀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六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5 冊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陳 昀 秀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陳昫秀 著 — 初版 — 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74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編：第 15 冊）

ISBN：978-986-254-609-3（精裝）

1. 教育行政機關 2. 教育史 3. 晚清史

618

100015463

ISBN-978-986-254-609-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254-609-3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作 者 陳昫秀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陳昀秀 著

作者簡介

陳昀秀，臺灣台中人，一九七九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提 要

本論文主要是透過江蘇教育總會在清末學界中的種種活動，突顯改革派士紳在清末複雜的政治、社會中所遭遇的困境。藉此個案研究，可以讓我們較為深刻地體會清末改革派士紳的雙面性，及其在傳統與現代轉化之間所面臨的困局。清末改革派士紳所面臨的困境有三。第一，改革派士紳的政治理想藍圖是依照英國、日本此等君主立憲國而建造的，所以他們勢必要與官方合作。但清廷卻因對種族與權力的畏懼，無法誠心地將這一股改革的力量納為己用。第二，改革派因屬於新興的社會勢力，並且具有中央公權力的加持，故與舊派地方紳董處於地方權力資源的競爭關係。而這樣的權力競爭關係，不只存在於地方社會中的兩派士紳，亦存在於地方官、改革派士紳和中央政府之間。第三，則是藉由下層民眾的反應，顯示改革理想與傳統社會習慣的不相融。層出不窮的毀學風潮，揉合了一般民眾對於洋人事物的恐懼和想像；而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對社會進行的科層化控制，與傳統中國控制社會的方式不同，使得下層人民感到無所適從。改革派士紳雖有啟蒙下層社會的努力，但當時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仍在政治改革的層次。本書企圖藉由此三種面向的處理與分析，讓我們更了解清末改革者所面臨的各種困境。



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清末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	13
第一節 中央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	14
第二節 各級地方教育行政體系	21
第三節 地方自治的影響	29
第二章 江蘇教育總會的成立	41
第一節 省界與學額	42
第二節 士群：學會	53
第三節 章程及組織架構	61
第三章 新舊不融：權力競爭的動態圖像	81
第一節 地方士紳權力的結構變化	83
第二節 地方學會與地方官府間的互動	88
第三節 下層民眾的反應：毀學風潮	98
第四章 清末士紳的政治和文化網路	115
第一節 江蘇教育總會與江蘇諮議局	116
第二節 江蘇教育會總會與新式文化傳播媒介	126
第三節 中央教育會與全國教育總會聯合會	135
結論	155
徵引書目	167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中，最先受到注目的是政治層次的變革，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中國由帝制走向民主的過程。在思想文化史的範疇裡，最迷人的議題之一在於知識體系的轉變，誠如張灝於〈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一文中所指出：「1890 年代的思想變動，引發政治上的改革，也開啓了一個社會文化的新時代」，1895 到 1925 年間，確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轉型期。〔註 1〕辛亥革命確實為中國注入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但革命的成功絕非一蹴可及，亦不能全歸為革命黨人的功勞。正如 Douglas R. Reynolds（任達）所言：「革命的成功，仰賴的是那數以萬計熱心於改革的菁英人物」，〔註 2〕此處所言之菁英人物，筆者以為即傳統社會中的士紳階層。

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正是近代中國知識體系轉型的重要關鍵。透過對教育的控制，統治階級將主流的符號和意義，內化於下一代，從而實現了統治階級文化特徵的再生產（Reproduction）。也就是說，統治階級透過教育，將自身的文化和價值合法化為社會的客觀文化和價值。〔註 3〕所以教育是一種文化再生產的過程，經過學校體系我們不斷地被相同的文化所複製。我想問

〔註 1〕 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收於《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126。

〔註 2〕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9。

〔註 3〕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邢克超譯，《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究竟是什麼原因改變了傳統文化複製的過程？新教育體系的產生，是一個原因，因為它改變了傳統知識體系繼續流傳下去的基因。在清末，不論「學堂」或「學校」，都是新知識、新概念的載體，它既是國家權力制度的展現也是社會公共領域中的一環。這樣的雙重特性，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教育改革中最為明顯，並且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然而，一個制度的產生和廢除絕對都不是像孫悟空一樣，平白無故地從石頭裡蹦出來，絕對有其相應的社會環境和變動。新學制的誕生與確立，始於 1900 年開始的新政時期，而其淵源卻應上溯至戊戌變法。1890 年代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轉變期的濫觴，失敗的百日維新，開啓了之後一連串的變革，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滿清，必須歸功於戊戌變法所埋下的思想種子。

戊戌變法運動，在政治上是失敗的，但在思想文化上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革，自此以後中國歷史的走向與傳統越來越遠，與西方越靠越近，不論在制度上，還是知識體系上，漸漸地都以「西化」為最高標準。在辛亥革命之前，實已進行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註 4〕特別是在 1901 年到 1910 年之間。由於社會的演變是一積累的過程，新舊因素的相互交織、影響，進而使社會各層面的變化更加複雜化，層層因素相互套疊，刻畫出現今的面貌。但在歷史的書寫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忽略失敗者，「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俗諺，如今審視起來實不虧為真理。在頌揚革命的同時，不論是戊戌變法、立憲運動還是清末的新政，皆被視為失敗品，不值一提。然而這些失敗的運動，和那些被革命者視為迂腐、過時的士紳卻是促使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關鍵力量。〔註 5〕綜觀近代中國史，自 1890 年之後，幾乎每十年一變，先是戊戌，再來是新政、然後是民國建立、五四運動和日本侵華，外在客觀環境的快速轉變，迫使人們不斷地

〔註 4〕 Douglas R. Reynolds 認為在 1898～1912 年，特別是 1901～1910 年間，中國在思想和體制方面，正在進行著一場 Thomas Kuhn 於《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言「典範轉移」的過程。雖然言之改革，但事實上卻一場等同於農業革命、商業革命、工業革命般的架構變化過程。《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頁 13～14。

〔註 5〕 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提到胡適認為《孽海花》屬於第二流的作品，因為其中的許多情節仍屬於「老新黨」的口吻。針對如此之批評，曾樸做了如下的嘲諷：「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很興奮地自命為新黨，還沒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曾樸，《魯男子·孽海花》，台北：桂冠，1984，頁 409）。曾樸的嘲諷之語，相當寫實的說明自清末以來，隨著思潮的轉變，每一代知識份子皆有自視其「新」的現象。

思考該如何去應付新局。而西方的思想資源於此時，猶如一廣大的藏寶庫，供當時的知識份子任意取用，還來不及好好地消化，就有新的問題要解決。在此一急就章的劇烈變動時代裡，無怪乎一切以「新」與「變」為上，太過老成與保守的折衷派，就變得不合時宜，而為時代所淘汰。

讓我們將時光倒回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當時掌握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變動的關鍵者，即為後來革命派份子所不齒的士紳。^{〔註6〕}戊戌變法若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啟蒙運動，那麼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則是戊戌維新份子思想真正落實與推廣的合法化時期。1901年，當慈禧在西安宣布變法時，許多維新派人士嗤之以鼻，認為新政不過是：「取戊戌之故事，一一行之於辛丑，全襲其題目而隱易其文章」。^{〔註7〕}但此時，各種社會啟蒙的形式與活動仍大量湧現，並且擁有一套完整的論述與系統，加上新政實經清廷之認可，在政治力的加持下，使得改革風潮成為一股有理念、有目的且有組織的運動。^{〔註8〕}在救亡情緒的催化下，政治制度的革新成為富國的首要目標，在改革派士紳的心目中，立憲政府的建立和政權的參與為其理想的政治藍圖，而與之並行的，便是嚴復所謂的「開民智」。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科舉制度的廢除皆受此思潮之影響。

回顧過去有關教育史的研究，往往過於僵化、冰冷，忽略了人的活動與思考，制度的形成與改變，不可避免的與「人」、「社會」有所關連，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互動式的。人，既是制度設立的客體與主體，也是創立者和被規範者，應是一種動態的關係的呈現。晚清新式教育制度的形成，是一段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相互角力和影響的複雜過程。不論是科舉制度的廢除還是新學制的

〔註6〕 由於江蘇教育總會在清末堪稱為當時省級的士紳集合體，所以必須對行文中所言之「士紳」、「紳士」和「知識份子」稍作說明。行文之中不論是言及「士紳」或「紳士」者，皆以當時人的稱呼為主。因為在當時這兩種稱法皆有，之間的區別並不清楚，另有「紳董」一詞，亦是時人對於地方士紳的一種稱呼。一般而言，「士紳」著重在「士」，學術知識意味較濃；而「紳士」跟「紳董」的著重點則在「紳」，偏重在地方社會身份的陳述。至於，「知識份子」一詞，當時人用的較少，且為西方的概念，故在本論文中並不常使用。由於江蘇教育總會的會員，在清末大多仍具有傳統功名或是社會聲望，政治傾向上為溫和的改革者。與張灝所言之「新知識階層」的出現，有所差別，故在論述與行文中，仍以傳統的「士紳」、「紳士」和「紳董」稱之，以求盡量符合當時人之用語。

〔註7〕 轉引自劉秀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67。

〔註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6。

確立，除了都經過長時期的思想醞釀外，也代表文化和社會的變化，並對往後的政治和各層面產生了深刻且深遠的結構性影響。筆者深深以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所牽扯的是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大轉向，也是整體知識體系的變動。在清末如此中央權力不振的時期，學部所制定的學制和章程是否能完全的落實，實為一大問題。根據許多的回憶錄和傳記，在在顯示出當時學習體系的混亂，而各省之間的教育行政，更是各行其是、各自管理，學部實無置喙之能力，各地士紳成為辦學的主要主角。

因此，要研究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轉變，不得不從士紳群體上著手；而思想文化的變革又牽涉到整體知識體系的變動，故教育是一很好的研究切入點。而江蘇教育總會恰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窗口。藉由江蘇教總會各式各樣的活動與實際作為，讓我們得以觀察晚清教育革新過程中的動態圖像，而非冷冰冰制度史的研究。

二、研究回顧與方法

關於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回顧，關曉紅於《晚清學部研究》中緒論的第二節〈學術史〉中，以時間為座標考察了學部研究的發展及變化，其回顧的內容不論是對於教育史料集的彙編，還是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有關中國近代教育史的中外二手研究，都作了很詳盡的說明與提要，極具參考價值。^{〔註 9〕}故本節主要是針對近代教育研究的方法和取向稍作說明，順便說明本研究的方法和取向。

當我們翻開一本通論性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著作，映入眼簾的大致可分為傳統教育的改革、近代新教育的萌芽、學制的演變和名家的教育理念四大部分。所以一般教育史的研究途徑不外乎有以下幾類：第一類的取向偏向思想史，此類研究方法多從著名的思想家著手，例如：鄭世興《梁啟超教育思想》^{〔註 10〕}、謝義勇《蔡元培社會教育思想之研究》^{〔註 11〕}和瞿立鶴《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註 12〕}等偏重思想性質的教育理念研究。此類研究，多半由西方或是現代化的觀點來解讀自清末以來教育思想的發展，

〔註 9〕 詳見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註 10〕 鄭世興，《梁啟超教育思想》（台北：幼獅，1980 年）。

〔註 11〕 謝義勇，《蔡元培社會教育思想之研究》（高雄：復文圖書，1990 年）。

〔註 12〕 瞿立鶴，《清末教育西潮：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萌芽》（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 年）。

往往缺乏整體的歷史與社會關懷，更無實際層面的論述，容易流於空泛。第二類則是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也是最多的一類，例如：學制、教育行政制度或是改革的計畫等等。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一書，〔註13〕可以說是傳統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典範，雖涉及區域與人物兩部份，但其關於湖北教育改革的內容，主要還是在學堂的課程、教學方法和管理制度；就湖北省的教育改革而言，則是偏重於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雖在第一章提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但此研究仍屬制度史的研究範圍。然而書中以學堂的課程為例言：「工藝學堂的漢文功課，大致與武備、農務二學堂一樣，都只在晚間學習而已，是『中體西用』思想在實際應用時偏差的一個例子」，〔註14〕來說明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在思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這一點是值得關注的。除此之外對於當時整體思想、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並無太多論述。另外，關曉紅的《晚清學部研究》，亦是制度史研究之範本。其目的在藉由對學部的研究，來瞭解清末新政中央體制的變動，及其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矛盾。但其視點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去看清末的教育變革，對於地方教育的變革和士紳的力量雖有提及，但著墨不多。

第三類則是由學術史的角度出發，主要是針對高等教育體系，例如：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註15〕和《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註16〕以及莊吉發的《京師大學堂》，〔註17〕此類研究易流於校史型態，忽略社會結構、政治以及其他歷史因素之間的關聯性，視高等教育的發展為一獨立的自主體系。Ruth Hayhoe（許美德）的《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註18〕一書，則是綜合性的論述大學此一教育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以西方、日本及蘇俄的影響來綜合論述中國大學的發展，著重點在民國之後大學

〔註13〕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註14〕蘇雲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頁146。

〔註15〕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註16〕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註17〕莊吉發，《京師大學堂》（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0年）。

〔註18〕許美德（Ruth Hayhoe），《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衝突的世紀》（北京：教育科學，2000年）。

發展的途徑是朝向資本主義模式（西方），還是社會主義模式（蘇俄）。此書的現實意識太過濃厚，屬通論性質的著作。晚清新政時期所成立的大學不多，只有三所國立大學和二十四所省立大學，學生人數不到五千，〔註 19〕且以京師大學堂為全國最高學府。因此嚴格說來，清末並無現代意義下的大學，直到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才開始有符合西方與現代意義下的大學。除此之外，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之所以偏重於高等教育，還有一個原因，即對於知識轉型的關懷。例如，陳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註 20〕以北大國學門的成立為例，處理外在學術環境的變遷對學者及學術工作的影響。而劉龍心的《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註 21〕亦是此類研究的代表，此書的研究重點在知識轉型過程中，知識分類方法（類別知識）的改變。知識的分類，屬於廣義教育的一環，因為知識分類方法與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相關，涉及到的是整體知識系統的變動，所以知識史、學術史皆與教育體系有所關連。例如，清末小學的廢經，和京師大學堂的學科分類，就都屬於廣義教育史研究的一環。

但筆者認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應該要像研究傳統的科舉制度一樣，顧及到社會的整體，而非單一的人物和點。近代中國教育的變革，除了思想文化外，更重要的是還涉及到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整體的變動，影響層面非常廣泛。例如：傳統教育體系的崩潰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除了帶動整體知識體系的轉向，還使得傳統帝制和君王思想體系面臨崩潰，政治權力必須重新分配，社會結構也為之一變。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一書，〔註 22〕即以張謇在南通的教育改革為核心，論及清末新政人物的轉變，對於清末當時的整體社會、政治和思想氛圍皆有所論述，是一以人物為切入點來看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研究論著。但是這樣的研究尚嫌單薄，因為只有一個代表人物。桑兵的《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註 23〕和《清末新知識界

〔註 19〕 周予同，《中國現代教育史》，轉引自許美德，《中國大學》，頁 65。

〔註 20〕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年）。

〔註 21〕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北：遠流，2002 年）。

〔註 22〕 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註 23〕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1991 年）。

的社團與活動》，〔註24〕都是以「知識份子群體」為考察的研究對象，且與社會脈絡的變動緊緊相扣，但研究重點仍以革命份子為主。

清末教育改革之所以為後人所稱讚，實應歸功於開明士紳（enlightened gentry, Bastid 語）的熱心辦學。而過去的教育史研究，不論是學制的演變還是教育體制的建立，往往都著重於「中央／官方」的觀點，而忽略了地方士紳的力量。開明士紳在清末是一股重大的改革力量，而其發揮力量的管道主要有三：報紙、學會和教育。其中學會是清末開明士紳傳播新學的重要集結點，1909年清末各地的教育會共有723個，足見其對於教育的熱情。而江蘇一地的教育會有55個，三年後成長到115個，〔註25〕可見江蘇當地士紳在教育界的力量。Marianne Bastid 亦言：「1911年之前，教育是溫和派改革者（moderates）的領域」。〔註26〕但過去的教育史研究，卻未曾仔細地研究過此類問題和現象，皆將其視為一般的學會組織，直到近來受新文化史研究熱潮的影響，近人亦開始對於清末以來的教育會社開始作研究。例如：張偉平《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註27〕此書廣泛地討論自1905年後的各式教育團體的發展，以期藉由清末民初以來的教育會社說明近代教育發展的內在機制和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

以教育會為名的學會組織，始於蔡元培的「中國教育會」，但1906年之後的教育會性質則與中國教育會大不相同，除了是溫和改革者的集合體外，且為清政府正式認可的合法士人組織。其中成立最早，且組織規模最大的省級教育會，當屬張謇、惲祖祈、許鼎霖等人組成的「江蘇教育總會」。江蘇教育總會成立於1905年，一直到1927年國民革命佔領上海後，因被國共兩黨打為「學閥」之巢窟而關閉，持續長達二十二年的時間。但江蘇教育總會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研究教育事務的民間團體，隨著外在政治、社會條件的變化，江蘇教育總會儼然成了江蘇省甚至是全國的一方之霸，透過種種的人際網絡，其所構成的勢力縱橫學界、文化界甚至與商界、政界都有所關聯。此一獨特的歷史現象，一直以來卻沒有人仔細地耙梳過。

研究江蘇教育總會的專著並不多，主要是放在江蘇省的現代化教育發展中被提及，例如：劉正偉的《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註28〕以

〔註24〕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1995年）。

〔註25〕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頁274。

〔註26〕 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91。

〔註27〕 張偉平，《教育會社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註28〕 劉正偉，《督撫與士紳：江蘇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章的份量將江蘇省教育會當作個案研究；而《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註 29〕中則有一小節稍微提及。劉正偉的研究，對於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變與組織架構作了非常詳盡的分析。除此之外，江蘇教育總會或是江蘇省教育會一詞，只有在研究教育會中的主要人物，例如張謇、黃炎培等人時才會附帶提起。由於資料的限制，江蘇教育會的研究以大陸學者居多，但亦多為單篇文章。臺灣學界，只有邱秀香〈清末江蘇教育會之研究（1905～1911）〉〔註 30〕一文，是專門介紹清末江蘇教育總會的，有關教育會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出自《申報》和《教育雜誌》以及《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團體》一書中所收集的文牘資料。在國際學界，相關研究則有 Schwintzer, Ernst Peter 的博士論文 *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註 31〕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總會的中堅人物——黃炎培，希望透過黃炎培的一生，來觀察 20 世紀早期中國菁英階層對於政治和社會的觀點。書中將教育會定位為「半官方（semi-offical）」的組織型態，但其重點在黃炎培的職業教育，而非江蘇教育總會。蕭小紅（Xiaohong, Xiao-Planes）老師的 *Education et politique en Chine: le rôle des élites du Jiangsu, 1905～1914*〔註 32〕則是第一本研究江蘇教育總會的專書，其切入角度著重於江蘇教育總會在政治上的影響，故其斷限於 1914 年，便是因為士紳們因袁世凱關閉各地省議會，而失去了地方的政治舞台。除此之外，蕭小紅亦有單篇中文論文〈從黃炎培與江蘇省教育會看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歷史演變（1905～1927）〉和一篇英文論文〈教育與政治：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省際菁英——

2001 年）。

〔註 29〕陳科美主編，《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註 30〕邱秀香，〈清末江蘇教育會之研究（1905～1911）〉，收於胡春惠、周惠民主編，《兩岸三地「研究生視野下的近代中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0 年）。

〔註 31〕Ernst Pete Schwintzer, *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 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 年)。

〔註 32〕Xiao-Planes Xiaohong（蕭小紅）*Education et Politique en Chine : Le Rôle des élites du Jiangsu, 1905-1914*（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1 年）。在此必須特別感謝蕭小紅老師，不論是史料的來源還是論文的提點都受到老師很大的幫助。可惜的是此書以法文書寫，限於語言能力，無法仔細的加以拜讀。

江蘇省教育會的個案研究（Chinese provincial elites at the tim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ducation and politics within the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註33〕，研究的取向仍是以政治角度為主。在日本，則有高田幸男的〈江蘇教育公會的誕生——教育界に建る清末中國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註34〕、〈清末江蘇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構築と教育会——江蘇教育總（總）會による地域エリートの「改造」——〉〔註35〕和〈辛亥革命前夕江蘇學務總會與地方教育界〉〔註36〕三篇論文。作者認為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並不只侷限於教育改革一途，還具有與地方議會相似的性質，且對之後的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影響。比較特別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蘇學務總會與地方教育界〉一文內容主要是根據《江蘇學務總會文牘》初編中所記載的學務糾紛，並將其分類，藉此探討在推行新教育的過程中所遇到的衝突，包括地方士紳之間的內部衝突、官紳之間的糾紛，是之前的研究中比較缺乏的部份。除此之外，不論是清末或是民初的江蘇教育會，在臺灣學界皆未被仔細的研究過。

不論是蕭小紅還是高田幸男的研究，大多偏重於江蘇教育總會這一群士紳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希望藉由此一個案探討士紳在政治權力的擴張與運作。筆者則希望透過江蘇教育總會此一民間士紳團體在學界的運作，觀察晚清在教育改革過程中，制度與實際上的落差和難處外，更進一步地希望透過對江蘇教育總會其他非關教育的活動，耙梳出清末士紳如何一步步地，在地方及全國藉由各種新式的文化媒介擴張其影響力，以及其在地方教育扮演的角色。

〔註33〕蕭小紅，〈從黃炎培與江蘇省教育會看國家和社會關係的歷史演變（1905～1927）〉，收於朱宗震，陳偉忠編，《黃炎培研究文集·二》（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蕭小紅，〈教育與政治：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省際菁英——江蘇省教育會的個案研究〉一文原為〈Chinese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with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4～1927〉發表於北大的一場學術會議，中譯本則需感謝蕭老師的慷慨解囊。

〔註34〕高田幸男，〈江蘇教育公會的誕生——教育界に建る清末中國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駿台史學》，第103號（東京：駿台史學會，1998年3月），頁1～29。

〔註35〕高田幸男，〈清末江蘇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構築と教育会——江蘇教育總（總）會による地域エリートの「改造」——〉，《駿台史學》，第111號（東京：駿台史學會，2001年2月），頁37～62。

〔註36〕高田幸男，〈辛亥革命前夕江蘇學務總會與地方教育界〉，《史林》，2002年增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93～96。

三、論文架構

在章節的安排上，除緒論與結論外，正文共分為四章。第一章「清末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除了簡單地陳述清末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外。亦藉由整體教育行政體系建立的過程，說明清廷在教育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基本上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不論是學部的成立，還是各級地方教育行政體系的建立，都是在地方先行的狀態下，才被動地設立一中央級的管理監督機關。透過對清末各級教育行政章程內容的耙梳，發現不論是省級的學務公所，還是府廳州縣級的勸學所，主要的執行者皆為地方紳董。中央僅派一提學使作整體監督管理的工作，如此的行政思考模式實未擺脫傳統。而隨著地方自治的實行，教育事務幾乎全劃歸地方管理，一開始甚至連勸學所也列為地方自治的機關之一。可見清末教育權力，幾乎完全掌握於地方士紳之手，而這樣的現象一直持續到北伐之後，才因全國政治的統一而有所改變。簡述完清末教育行政體系建立的大背景與士紳和教育的關係後，第二章「江蘇教育總會的成立」，便直接切入正題講述江蘇教育總會的成立與其組織架構的分析。本章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針對江蘇一地在新學制中所遇到的阻礙與問題，分析「江蘇學會」成立的原因跟背景。第二部份，則是對清末的學會作一簡單的歷史回顧，藉此說明「學會」此一組織對於清末士紳的重要性和歷史意義。並且藉由江蘇各地士紳的熱烈反應，來說明清廷制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時的心態。最後則是對總會的組織、架構和章程作一分析，說明總會的運作程序，並彰顯總會在清末眾多學會中的獨特性。

第三章「新舊不融：權力競爭的動態圖像」，則是利用總會出版的文牘中所記載的調查報告，來觀察清末新式教育在推行過程中所造成的權力衝突。由於學會和新式學堂皆為新學的主要傳播媒介，在推行的過程中容易受到舊勢力的反彈。不論是新式學堂的興辦、經費問題，還是各府廳州縣學會的成立，都會產生跟傳統社會運作模式不合之處，甚至是侵犯到原本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地學務糾紛不斷，地方士紳之間、士紳與地方官之間、士紳與一般民眾之間，都有許多新舊衝突的現象。此類衝突隨著清末新政推行腳步的加快，和地方自治的實行，在宣統二年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毀學風潮，細究其原理，皆可以「新舊不融」四字總結。藉著總會在處理此類衝突時的態度，又可發現當時士紳們對於政府，及行政權力的不信賴，極度地想要擴張社會／民間的力量，認為社會應擔負起改革的主要力量，新的社會思想逐步地成形。

最後一章「清末士紳的政治和文化網路」，則是想藉由教育總會在 1910 年之後，積極參與全國性的運動來說明清末士紳的活躍。除了教育會此一舞台外之外，在政治上有諮議局，在經濟上有商會、勸業會，在文化上有各式各樣的期刊和報紙媒體，可供清末士紳利用及發表輿論。如此一來，政府與社會／士紳之間的權力衝突現象在最後這一兩年之內，達到了白熱化。而中央教育會的召開，更顯示出清政府對於新興社會力量的態度充滿敷衍，並未真切地想要將之納為己用。加以「皇族內閣」的出現，江蘇教育總會的士紳們在清廷的統治之下，看不到理想藍圖實現的未來，遂於辛亥革命之際轉向，成為壓垮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

清廷預備立憲詔的頒佈，促使改革派士紳加快了立憲運動的腳步，而教育普及和國民教育成了當時教育改革的重心。也就是說，士紳們認為新政的教育目標是放在如何地讓廣大的下層民眾接受教育，好讓他們具備國民的資格，為新的政治體制做準備。但是，清政府是一個傳統的舊式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源和人力，所以必須大量地借用身為社會中堅階層——地方士紳的力量，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使得地方士紳在傳統社會上所應負擔的責任合法化，亦讓他們嚐到了甜頭，準備爭取更多的權力。歷史絕對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尤其是在這麼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體制的更動絕對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其連鎖反應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Phillip Kuhn 認為，中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有很深的社會制度根源，而地方名流（local elite，即地方士紳）則是此一穩定性的關鍵。〔註 37〕所以，清末中國傳統社會的崩潰與士紳階層的變化息息相關，而新政的措施與政策，正是改變士紳態度的主要催化劑。革命往往發生在政權開明和政治逐漸放鬆的時候，由於清政府在宣統二年之後對於政治改革開始日趨保守，緊弛之間，使得初嚐議政權力的士紳害怕理想的幻滅而轉趨支持革命。所以，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成功，其中的一個因素便在於士紳態度的轉變，而江蘇教育總會的士紳態度堪稱為此類典範的最佳代表。

〔註 37〕詳細論述參見孔復禮（Phillip Kuhn），《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 年的軍事化及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0 年），第一章的第一節：近代史的時限。